

嘉善印象

在干窑中学的那些时光

■杨善岗

干窑中学是我的母校，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那里蹉跎了4个春秋，潦草地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由于历史原因，那段时间教学秩序混乱，尽管我在学校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是对母校还是怀有别样的情感和深刻的印象。

我们上学那时，学校的大门是朝南面向小窑港开的，大门并不开阔，两侧紧挨着民居，往西约50米，是“老苏州”的小卖部。门前河滩上是一块菜园，主人姓胡，是我们大队综合厂的会计，娶了个亭桥(后来并入了干窑村)的老婆，也学会了种番茄的技术，菜园里硕大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番茄独有的气味，令人馋涎欲滴。

走进大门，是一片不大的场地，环绕场地分布着教学的主辅设施。正对大门的是两层的教学大楼，楼上楼下各有4间教室，我上初中时的教室是楼下东面第一间，上高中时的教室是楼上西面第二间。教学楼建于1964年，教室亮堂，走廊宽敞，水泥地面，灰板吊顶，在那时肯定属于“高大上”的建筑了。除了8间教室外，4个楼梯间也都派上用场，西边阁楼是广播室，底楼是图书室；东边阁楼是书记办公室，底楼是医务室。教学楼的东边是一幢两层小楼，楼上是教工宿舍，楼下是总务处，再往东便是厕所了。小楼隔着那片场地对面是两间平房，上初中时五班的教室就设在那里，地方虽然不起眼，但集中了同级的靓男美女，格外引人注目。

场地的东边是学校的礼堂，也是室内运动馆，设施极其简陋，只有几张乒乓球桌，地面也未硬化，那时爱玩的我们经常在那里“斗鸡”。礼堂南侧是师生的食堂。食堂南面开有一扇小门，出去就是学校的校办工厂和教工宿舍。

大门的西侧是片边界不太规则的操场，有五六亩地，在孩子的眼中，那是一片十分宽阔空旷的广场，公社的大型集会经常在这里举行，届时，学校门前的小窑港上会调用“浙江一厂”运坯的平齐船搭几座便桥，以减轻醉翁桥的通行压力。

操场南边凹进去的地方是沙坑和双杠、单杠，西边是两片篮球场；中间是径赛跑道，从西围墙延伸到礼堂门口能凑够100米，我曾经在这个

跑道上驰骋，拿过初中组的百米金奖。

操场西侧围墙外，还有一个小院子，是教工和住校女生的宿舍。初中毕业时，为满足部分学生“初升高”的需求，那时开办了一个音乐实验班，教室也设在这里。

这是留存我记忆中的母校校园，当然仅仅是当时学校的外观。关于学校的历史，我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据《干窑镇志》记载，干窑中学创建于1960年9月，当时正值嘉善县建制撤销并入嘉兴县期间，故称“嘉兴县第十七中学”，1961年4月恢复嘉善县建制后，更名为“嘉善县干窑中学”。建校时，校址在干窑公社中心小学的东南角，建有一幢呈“U”字形的平房，仅6间教室，首届招生3个班143名学生，有教工5人。1964年9月易地新建，搬入现址，陆续修建教育及其他附属设施，规模不断扩大。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一个大学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名大师。同理，对一所学校而言，重要的不在于建筑，而在于老师。我们就读期间，干窑中学的师资力量之强是史无前例的，许多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名师，比如教过我们的连邵荣老师、杨松年老师、王卫明老师等等，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下放到这里。也有许多出类拔萃的青年，因为没有正常的升学通道，只能成为民办老师，比如我们初中的班主任皮老师，还有隔壁班的李老师、沈老师等等，为缓解当时师资结构性紧缺作出了贡献，个人后来也都发展得很好。他们都值得我们的敬重和怀念！

现在，当年的这些建筑都已经拆除了，1989年前后，教学大楼东南的小楼及礼堂、食堂先后



在学校原教学大楼前留下的初中毕业合影(1976年7月)

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两幢综合楼和办公楼；1992年原先的两层教学楼也在学校扩建时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四层教学大楼。

2020年11月8日，我应邀参加建校60周年的校庆活动，参观了焕然一新的校园。这是我1978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回到母校，时隔40多年，变化之大用“改天换地”形容也不过分。校园扩大了，原来“浙江一厂”隧道窑的地块已经并入校区；环境优美了，绿树成荫，花草葳蕤。学校有教学楼、综合楼、图书楼、食堂、宿舍楼，还有环形塑胶跑道、篮球场等等。校园设有内部网络、闭路电视、音响系统、多媒体教室、窑文化陈列室和实践基地，俨然是一所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学学校，已经看不到当初的一丁点痕迹。

原来的那些老师或调离或退休，都陆续离开了学校。他们只存在于校史里，出现在同学聚会时的交谈叙旧中。母校的老师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的教师形象和气质跟我们那时截然不同，看起来都那么年轻、靓丽，充满朝气，有的我甚至分不清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知是穿了统一的职业装？还是有美丽校园映衬？都是又都不是，那是因为他们年轻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当年“臭老九”那种忧郁、压抑、惆怅的神色。是呀，母校的一切变化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嘉善雅韵

昆腔雅韵伴七夕

■禾塘

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又称七巧节、乞巧节等，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美丽爱情故事早在先秦时期就在民间流传。而在嘉兴地区，历来有喜爱昆曲的曲友在七夕举行曲聚的传统。清代项映微在《古禾杂识》中写道：“禾中……昆曲嗜者甚多，入夏即招同志，开局演唱。少年子弟艳之，皆醲入局肄习，每逢荷花生日、乞巧日，两度放舟烟雨楼，彼此肉肉竞奏，彩船箫鼓，游履如云。一昼夜必唱数十出，蝉联不断。”此风延续至民国年间，且已不局限于嘉兴一地，最著名的七夕曲会，莫过于上海啸社与嘉兴怡情曲社合办的丙子七夕鸳鸯曲会。

1936年8月23日(丙子七夕)，上海啸社为纪念70期同期(折子戏)，与嘉兴怡情曲社一起，在嘉兴南湖烟雨楼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鸳鸯曲会。嘉兴怡情曲社由“兰台药局”主人徐怡声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固定在张家弄寄居的薰香馆中拍曲，每年七夕必在烟雨楼上举行同期曲会。那一次，上海啸社和嘉兴怡情曲社联合举办七夕曲会，吸引了江浙沪多个曲社，如上海庚春社、平声社、粟社、苏州道和曲社、桐乡陶社、海宁永言社等知名曲社，有记录的参会曲友达90余人，包括吴梅、徐凌云、曹仲陶、褚民谊、沈衡一、潘祥生、朱尧文、管际安、居鸿逸等资深曲家。曲友年龄最小的15岁，最年长的70岁。曲会从当天上午10点开始，唱至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历时20小时，通宵达旦，共唱了42折同期。曲会结束后，居鸿逸编印了一册《鸳鸯记曲录》，详细记录了那次曲会的举办情况，包括到会名录、演唱曲目等，并请参加曲会的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吴梅先生和嘉兴怡情曲社社长蒋怡青分别作序。

担任那次曲会后场的人员，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担任主笛的是嘉兴怡情曲社的著名曲师许鸿宾、金寿生和传字辈笛师蔡传统，后场人员另有全福班名艺人陈凤鸣、传字辈艺人华传萍与张选青、沈三民、胡品三、王张生，共9人，均为一时之选。从参会人员、曲目数量和后场阵容上，我们能感受到那次曲会空前绝后，是足以载入昆曲史的一次盛会！

当年有一位嘉善人参加了那次七夕曲会，他就是著名曲家陆济民先生，他在曲会上主唱了《西楼记·拆书》，帮人搭了《长生殿·弹词》《西厢记·佳期》《西厢记·拷红》。陆济民先生多才多艺，与众多文化名流交往密切，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吴梅先生曾为他题跋：“济民先生工诗工书工度曲……”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昆曲，以其典雅的文学性、优美的唱腔和精致的表演而闻名，深受历代文人雅士的追捧。历史上，嘉善与昆曲颇有渊源，清末民国时期曾涌现过许多民间昆曲班，如西塘“玉成奏”、干窑“鸿声奏”、丁栅“荣和奏”等，其中“魏塘的九成奏为禾中之杰”(见《古禾杂识》)。为培养昆曲班艺人，下甸庙甚至还有专门的昆曲子弟学校。浙江昆剧团的前身“国风昆苏剧团”，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间文艺团体，在嘉善完成了注册登记，当时刚分配进嘉善县文化馆工作的管玲缇阿姨，还给剧团的艺人上过政治课。5年后，他们改编的昆剧《十五贯》红遍大江南北，并进入首都怀仁堂演出，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被誉为“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当年昆苏剧团之所以在嘉善注册，是因为嘉善有众多的昆曲知音，尤其是西塘观众，不仅懂戏，还有爱心。当时剧团历经战乱，生活困顿，是西塘观众在生活上不断接济他们，“玉成奏”班还借给他们乐器和戏服，演员与观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传瑛先生的夫人、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娴女士还为西塘诗人、书法家江蔚云先生的自印诗集《阳波阁诗词集》题写书名，留下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为了弘扬地方文化，传承昆曲艺术，2024年七夕节，嘉兴曲友在嘉善云澜湾举办了首届云澜湾七夕曲会。全国近200位昆曲爱好者来到嘉善，以曲会友，共同完成了一场散曲专场(31首古诗词昆唱)、4场同期专场(24个折子戏演唱)。七夕那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大家戏称，这是史上热度最高的曲会。是西塘观众在生活上不断接济他们，“玉成奏”班还借给他们乐器和戏服，演员与观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传瑛先生的夫人、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娴女士还为西塘诗人、书法家江蔚云先生的自印诗集《阳波阁诗词集》题写书名，留下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又一个七夕节要到了，第二届云澜湾七夕曲会也要在嘉善召开了。本次曲会除了嘉兴曲友挖掘整理的嘉兴著名曲家庄一拂先生的昆曲作品《十年记》等27折同期的展示外，还新增了一场由30支经典昆曲唱段组成的清唱专场，开幕式上还会有几组彩唱表演，值得期待！

希望通过七夕曲会，让昆曲遗韵在嘉善重放新声，让更多年轻人拥抱传统文化，感受经典艺术。

嘉善记忆

熔在骨子里的记忆 ⑮

骑脚踏车的时光

■沈水根

当今，为了方便老百姓绿色出行，马路边设了许多共享单车停放点，市民们只需办张卡或用手机扫个码就能骑行。不过嘉善人很少叫“共享单车”，更习惯称“脚踏车”。

如今的脚踏车，早已是普及又亲民的物件，车型也丰富多样：折叠车方便携带，山地车适合越野，儿童车则专为孩子设计。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骑车出行，既锻炼身体，又兼顾环保。有些五六岁的孩童，早早便学会了骑脚踏车，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随着成长不断换车——我孙子就已换过4辆，最近我们又给他添置了一辆山地越野变速车。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国际自行车联盟正式承认山地自行车运动，1996年它更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让山地自行车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

而回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脚踏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那时的手表、缝纫机、脚踏车被称为“三大件”，是年轻人结婚时的标配。家里能有一辆脚踏车，堪比现在的私家车，是家境殷实的象征，在邻里间格外体面。

那会儿的脚踏车，正处在风光无限的年代。嘉善人尤其认几个牌子：上海自行车厂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的“飞鸽牌”，杭州的“海狮牌”，还有本地嘉兴自行车厂生产的“大雁牌”和“飞叶牌”。车型从20英寸到28英寸不等，链条有半包和全包两种款式。颜色起初大多是沉稳的黑色，后来为了迎合女青年的口味，又加了湖蓝、绯红、浅粉等靓色，给脚踏车增添了几分灵动和俏皮。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飞速发展，村容村貌日新月异，人们对改善交通的需求也愈发迫切。当时有句俗语很流行：“要致富，先筑路。”但那会儿经济底子薄，修不起等级公路，只能以乡为单位，自行规划建设乡村简易公路。记得1983年春节刚过，凤桐乡西北片的6个村就动了工。路宽设计为3米，两边用块石加水泥浇筑30厘米宽的护肩；路基先用泥土垫高，再铺一层细渣夯实，最后撒上嘉善人叫“瓜子片”的碎石子，用推土机压实压平，一条泥结碎石路就算建成了。

路通了，农村家庭条件也慢慢好起来，买脚踏车成了最时髦的事。可那时一辆脚踏车要130

元到170元不等，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堪称奢侈品，不是谁都买得起的。更要紧的是，就算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当时计划经济正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但不少商品还得凭票供应，脚踏车也不例外。脚踏车票是逐级分配的，到了农村，往往从乡里分到村里，因数量太少，只能落到少数人家手里。城里人稍好些，单位每年会发票，有人拿到后常会转送给乡下的亲戚朋友，这份情谊格外珍贵。

我学骑脚踏车还是在部队的时候。那时炊事班每天要买菜，司务长配有一辆28英寸的脚踏车，后面书包架两侧挂着两只长方体的铁筐，他每天早上就骑着这辆车去城里采购。我当时在连部当文书，跟司务长关系不错，晚上有空就找他借车，去师部大操场学骑脚踏车。

刚学时，车龙头总是不听使唤。人坐在车上，重心老是稳不住，车子歪歪扭扭的，稍不留意就会连人带车摔在地上。那段日子，两只脚的“讨饭骨”(方言，学名叫下肢“胫骨”)上撞出很多乌青块，好在我能吃苦，不怕疼、肯琢磨，反复练了七八次，虽说摔得浑身筋骨痛，但总算学会了骑脚踏车。

1983年底，我从部队退役回乡，被安排在乡政府上班。父亲托人弄到一张脚踏车票，卖掉了两只大肉猪，给我买了辆28英寸的“大雁牌”脚踏车。我拿到车时，心里高兴得无法形容。揣着发票，当天就骑着新车去了魏塘派出所，给车子敲钢印、上牌照。那会儿对这辆车的爱惜程度可用“嚇煞宁”(方言，即“吓死人”)来形容：特地坐在车的坐垫下塞了一团干净的“回丝”(废棉纱)，以便随时能擦擦灰尘；每天下班，不管多忙，都要到河埠头用清水把车子仔仔细细擦洗一遍，再用“回丝”一点一点揩抹，直到车子擦得清清爽爽、乌黑锃亮才罢手。

1985年以后，脚踏车普及城乡，嘉善人风趣地把28英寸的旧脚踏车称为“老坦克”。那时，无论新闻、小说还是影视，若要刻画先进人物，常会描写某人骑着“老坦克”早出晚归奔走在工地上，或是某基层干部骑着“老坦克”深入农村一线，与农民群众心连心——这样的描写，总能让人物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脚踏车也在不断创新改进。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一些厂家适时推出了山地车、赛车等车型。这类车装有调速器，骑起来轻便快捷又时尚，成了好年轻人的首选。

以前，我每天骑脚踏车上下班，时间久了，发现乡村公路出现凹凸不平，骑在路上颠簸得厉害，后来索性骑到路边30厘米宽的护肩上，想借此避开路面的颠簸。

有一次经历，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天我在护肩上骑得飞快，没料到车轮突然打滑，整个人一下子摔进了村边的毛灰潭里。左边的“讨饭骨”外皮被划开一道约两厘米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我强忍着疼痛回了家。到了第二天，左脚小腿肿得像块木头，完全动弹不得，只好让父亲送我去乡卫生院包扎。医生检查后说伤口已经感染，需挂盐水消炎治疗。就这样连续挂了三天，情况才慢慢好转。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左脚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如今街头的共享单车来来去去，扫码即走的便捷，少了当年给“老坦克”擦灰、补胎的那份上心。每当看到人们骑着脚踏车经过，总会想起当年握着车龙头的日子——摔跤的疼、爱惜的暖，都跟着车轮转成了岁月里的刻度，磨不掉、忘不掉，就像车铃的回响，轻轻巧巧，能在记忆里叮当作响一辈子。

